

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述评

1984年5月30日至6月5日,在武汉东湖之滨,召开了《周易》学术讨论会。时值江城初夏,梧桐张伞,绿柳垂枝,湖光耀金,远山滴翠。与会代表没有沉醉于迷人的湖光山色,却热烈地探讨着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课题——《周易》。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古文献、考古,以及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久享盛名的学者、专家,也有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和坚持业余研究的实际工作者,共一百五十余人。会议收到一百二十余篇论文,五部专著。

这是一次以《周易》为结合点的多学科综合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反映了建国三十年来《周易》研究的新进展、新成就、新水平,开辟了《易》学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易》学研究的新课题,标志易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易》卦起源问题的新突破

会议展出了近年出土的有关《周易》的文物图片资料,主要有大汶口文化层六画图案的骨梳、陕西周原以及其他地区出土的数字卦甲骨与陶片、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中早期竹简“占筮记录”,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初帛书《周易》等。安徽阜阳出土的汉初竹简《周易》虽未及展出,但在会上作了专题介绍。有关《易》的这些出土文物,大大促进了关于《易》卦的起源与《易经》结构形成过程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

关于《易》卦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件公案。或主生殖器崇拜说,或主龟兆说,或主方位说,或主竹棍、蓍草象征说等等,这些探索与推测,随着对出土“奇字”问题的解决都已成为过时之论。三十年代,郭沫若曾认为安州中鼎长篇铭文后的两个符号是表示族徽的“奇字”。五十年代,唐兰又结合在河南安阳、西安张家坡出土的“奇字”甲骨,认定这些“奇字”都是由数字组成的,从而把对“奇字”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仍未与易卦联系起来。七十年代末,随着陕西周原“奇字”甲骨的出土,对这类由数字组成的“奇字”的认识又一次被提上日程。张政烺根据奇数为阳、偶数为阴

的传统说法,以阴阳爻画取代数字,惊奇地发现这些“奇字”原来仅是易卦。三个数字组成的是单卦,六个数字组成的是重卦,四个数字组成的是互体。如果从1118年湖北孝感出土的安州中鼎长篇铭文之末的“奇字”算起,八百余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正确的回答。

张政烺的这一贡献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重视,给予易卦起源的研究以直接影响。徐锡台认为,“《易》中阴阳卦象,不是殷周时期的八卦原形。殷周时期的八卦原形,……实系用一、五、六、七、八、九等三个或六个相同或不同的数字组合而成的,它与西南彝族所使用的‘雷夫孜’的数卜法,即奇偶数占卜法极为相似。”张政烺在为会议提供的论文中进一步分析了由数字卦向阴阳爻卦画的演进过程。他说:在众多的出土数字卦中的数字,“六最多,一次之,二、三、四都是零,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我的看法是一、三、三(四)都是积画为之,写在一起不易分辨是几个字、代表哪几个数,所以不能使用,然而这三数并非不存在,而是筮者运用奇偶的观念当机立断,把二、四写为六,三写为一,所以一和六的数量就多起来了。……近几年来,又见到许多古筮的考古资料,总共有百十来卦例,全无二、三、四这三个字,增强了我的信心。这一点果然能成立,则殷周易卦中的一的内涵有三,六的内涵有二、四,已经有符号的性质,表现一种抽象的概念,可以看作阴阳爻的萌芽了。”至于阴阳爻的最后形成,张政烺认为:“一、阴爻形成的标志在读音上,到爻题有初九、用九即已完成。二、阴爻形成的标志在字形上,到八(六)分裂为两段横画才算完成。安徽阜阳双古堆竹简《周易》和长沙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是现存最早的《易经》,都有爻题,一读为九,不再有数值的意义。八(六)的读音未变,字形的变化就慢,双古堆竹简尚作八,保持原形,马王堆帛书才将八字从中间劈开并向两边延长。汉字的书法横画皆由左向右曳,画阴阳爻也不例外,帛书阴爻作止,《即一一从中间落笔,是八字一分为二的遗迹。到东汉末熹平石经《周易》,阴阳爻都变成极整齐的长短横画,不与文字相同了。”

帛书《周易》的出土,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探讨的新问题。韩仲民依据《序卦正义》“二三相耦,非复即变”之说,认为通行本《周易》不存在重卦问题,而帛书《六十四卦》则是“以重卦的方法,将上、下两个单卦重合在一起,组成了六十四卦。这是经过改编的结果,其时代必然较晚。”因此,《易传》的“八卦哲学”适应帛书《六十四卦》的结构,而与通行本六十四卦的组成和排列的方式不相符合。所以他认为,六十四卦在先,八卦出现在后,“八卦重卦而成六十四卦是汉代人的说法”。

二、《周易》研究在哲学上的新进展

对于《周易》的哲学思想,除了继续分别对《易经》与《易传》的宇宙观与方法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动向。如周继旨从信息系统的角度研究《易经》的结构,认为它是一个古老的信息转换系统,它在理论结构上的特色是文字系统与符号系统的并存又互相渗透结合。“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是两种不同层次的信息形式。在交流思想、传达感情、凝聚升华感性知识,贮存递接认识成果等方面各有其独具而不可代替的作用。”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尽管存在着种种区别,但二者“都是思维活动借助于把人创记号固定于物质载体而‘外化’和‘贮存’起来。这种‘静态’信息系统的优越性在于:摆脱有声语言直接依赖于说、听等感性生理活动的局限,可以‘易时’、‘易地’,超越时、空,把过去的思维成果和当前的思维活动联结起来。”《周易》理论结构的这种特色,不仅使思维内容能在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之间来回转换,实现认识发展所必需的各种循环往复,而且使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有着可以驰骋想象发挥创造的广阔天地。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可以援《易》以为说,这一事实说明《周易》的理论结构有为科学资用的方法、原则、范畴框架、符号系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周易》以来的易学系统中,蕴含着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周继旨的这一努力,在《易经》哲学研究上展开了新的方面,方法论上具有浓郁的新时代的气息。无疑,这种努力对于从多方面开拓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十余年来,《周易》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然而在具体见解上却存在着不少分歧。这些分歧的形成,除了对文字本身的理解差异所致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影响《周易》哲学思想形成的其他学术流派注意不够。正是基于这一

原因,萧蓬父探讨了《周易》与早期阴阳家的关系。他认为:筮数的奇和偶,最初仅是一种数学的抽象;画为爻象——,也并不反映什么物理(天地、日月、刚柔)或生理(且比、牝牡、男女)的具体内容,更谈不上具有哲理的涵义。《易经》乃至殷墟卜辞中,无对举的阴阳字,阴阳范畴的逐步形成,乃是早期阴阳家和其他哲学家的精神劳动成果。”为此,他考察了阴阳范畴的形成过程以及早期阴阳家带有自然哲学性质的阴阳数度之学,认为“正是在这样一些哲学劳动的基础上,《易传》的作者才有可能把‘阴阳’作为中心范畴,把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考察,从而对《易经》原有构架的基石“——”二爻给以新的哲学规定,对其中关于数理、物理、事理的矛盾关系的分别抽象(诸如奇偶、参两、乾坤、刚柔、否泰、剥复等等)给予新的系统化说明。《周易》因《易传》作者的哲学加工而获得了新的理论生命”。《易传》所发挥的一整套“阴阳之道”的朴素辩证法的宇宙观与“絜静精微”的范畴体系,在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萧蓬父关于《周易》与早期阴阳家关系的研究,观点新颖,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并且含有方法论的意义。这就是,无论研究《易经》或《易传》,只有将其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与思想环境中加以精密考察,才能较为正确地评介其哲学思想与历史地位。

《周易》哲学思想研究的另一进展,表现在将《周易》与其他哲学流派特别是《老子》的比较研究上。李德永认为,《易经》是在“小邦周”取代“大邦殷”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条件下成书的。因此《易经》反映了周族统治者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如乾卦),读后使人振奋,心胸开阔,是青春焕发的青少年哲学。从整体上说,《易经》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老子》“反者道之动”是春秋末战国初时代精神的反映。“弱者道之用”看到了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老子》是老头子哲学,祖父哲学,对自己的童年无限羡慕,不是老当益壮,而是老而无为,无为又无不为,头脑比较冷静。象苦瓜,虽苦而有趣味。《老子》思想丰富,但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又有片面性,于是出现了《易传》刚健而不莽撞的青壮年哲学,代表了先秦哲学的成熟形态。张岱年认为:“老子的柔静学说对于中国文化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易传》的刚健学说。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复结绳而用之’,庄子学派更宣称‘文灭质,博溺心’,这都是对于文化的否定。所以老庄学说只能作为儒学的补充,而儒学在中国

古代文化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儒家学说中,《易传》作为孔学的重要内容,影响实为最大。”“《易传》的‘日新’、‘生生’以及‘刚健’‘自强’的思想鼓舞人们不断前进;《易传》的‘裁成’、‘辅助’的思想更有保持生态平衡的深刻意义。”特别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着许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进行新的探索,把文化事业推向前进,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实。”因此,《易传》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不断前进不断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起了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

三、易学史研究的新开端

《周易》自成书以后,流传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汉代,《周易》被尊为五经之首,自此说《易》、注《易》、释《易》之作屡代迭增,从而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易学是一种多学科的结合体,它包容着哲学、宗教、政治、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各种自然科学。而各代易家的立论与侧重面又多相殊异,如何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易学发展的思想长河?如何处理各家各派易学思想之间的区分与关联?这是研究易学史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解放三十余年来,一直未能将易学史的研究提上日程。近年才陆续出现一些研究个别易学家或易学著作的专论。到这次会议召开,这方面的研究方始出现第一个高峰。会议收到广泛涉及各个时期的易学家或易学著作(如扬雄《太玄》、王弼、程颐《程氏易传》,张载、朱熹、保巴、来知德、方以智、王船山等)的大批专论。其中唐明邦对汉代《周易》象数学中思维模式的研究,以及韩敬有关《周易》与《太玄》的论叙,是解放以来对难度较大的汉易的第一次进军,无论从易学史还是哲学史上说,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伴随着这些专论,同时出现了一些通论性的易学史概要。如任乃强的《易学流派综述》、潘雨廷的《易学史简介》、刘大钧的《历代易学研究概论》。这些通论篇幅都在三万字左右。或不分章节,依自然线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徐徐而论,自成条贯;或分章分节,纵横交错,有分有合,落落有致,严整不乱。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易学史问世,因此,这些通论无疑都是有着宝贵意义的尝试。随着这些尝试性的通论的出现,必然要引出一系列有关论撰易学史(包括单科性的易学史,如易学哲学史、易科学史等)的理论问题,即易学史方法论问题。

潘雨廷认为,易学史首先应当摆脱经学的狭隘

范围,因为经学不足以尽易学。“即两汉盛行经学之时,已有《易林》、《太玄》、《太平经》、《周易参同契》等,可谓非经学之正宗,然未可谓非易学之名著。又孟、焦、京之传,有施、梁忌孟于前,瞿、白轻焦于后。京氏丧身,尤见政治斗争之险。未久而京氏易仍立学官。然孟、京之易二千年不与经学并论,况民间尚有费、高之易。于魏晋后之易学发展,更非经学可囿。”因此,一方面易学史“须属六经之原”,另方面“尚宜包括其他(寄托于《易》的)各种思想文化”。这是他关于易学史范围的见解,至于易学史的结构,他认为应以“《易》以道阴阳”为主线,“由战国上推阴阳概念与易学的关系,以下即以《易》道阴阳的观点,叙述易学与各种学科相互发展的史迹。”

朱伯崑根据自己编写易学哲学史所碰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认为“易学哲学中的路线斗争和派别斗争,推动着其理论思维的发展。但是这一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哲学说,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流派,就易学说,无论是象数学派还是义理学派,他们的学说又是相互影响的,彼此之间存在着批判地继承关系和相互扬弃的关系。不同的学派在斗争中,经常吸取对方的思想资料和个别的论点,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内容。例如,汉易主卦气说,哲学上则以阴阳二气消息说明天道和人事变化的规律性。魏晋时期以王弼为代表的易学,则主取义说,以卦象和阴阳之气为有,以其义理为‘无’,宣扬万有以无为本的玄学唯心主义,这是对汉易哲学的否定。但是,玄学派的易学哲学,并没有取消阴阳二气说,而是将其置于贵无论的体系之下,视为虚无实体派的东西,以此丰富其理论的内容。唐朝的孔颖达于《周易正义》中,又将王弼派的玄学理论加以改造,保存了其中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无为论,扬弃了以虚无为实体的观念,又重新肯定了汉易哲学中的阴阳二气说,并将它向前发展了。又如,宋易系统中王夫之以气为太极,是对朱熹以理为太极的否定。但王夫之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朱熹的太极说,而是从唯心主义者朱熹的易学中吸取其关于太极自身展开为六十四卦的观点,从而确定了以‘太和絪縕之气’为世界本质的本体论的学说。因此,研究易学哲学史,如果看不到各派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影响,将思维路线的斗争简单化、绝对化,同样不能揭示出其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四、易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新探讨

易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近年来颇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许多专家学者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在易学与古代天文历法、数学、医学、气功、养生学等的关系，易学与现代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分子生物学、二进制数学、线性代数中的八阶矩阵等的关系上进行了新的探讨。而这些探讨的成果，大都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反映。如赵定理在考察了《周易》与古代天文历算的关系后，认为《周易》的源头是大天文历算规律，从而认定“它理应同现代科学有联系”。他从现代天文年历给出的日月位置，探讨地心黄道面内的相对运动，本来是引力场中的相互作用的课题，但却由此得到新的六十四卦点量子化规律，从而使量子论与相对论这两种根本不能协调的理论统一起来。又如潘雨廷通过研究RNA和DNA中化学键的“象数”，认为当RNA与DNA稳定时，恰好有六十四种遗传密码。“至于遗传密码的形成，须本三联体。今以氢键数视之，自然有六、七、八、九四种不同的象数。”他认为通过氢键数分辨六十四种遗传密码，“上可研究RNA与DNA转化的原因，下可考察相应于二十种氨基酸的变化情况”。

《周易》体现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因而它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地位，应当予以充分肯定。至于《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尤其是最新尖端科学的关系，也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探索性的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或因有关的科学知识欠缺，或因易学本身掌握不多，或因这两方面的知识准备都不充分），在开始的时候难免出现一些简单比附的现象。这并不足以说明《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毫无联系。萧蓬父认为：“反历史主义的‘古已有之’论，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曾经流行过，是一种落后的愚昧的表现，显然是错误的；然而粗暴地视为全是出于牵强附会，也是简单化的‘左’的幼稚病。”《周易》对现代自然科学呈现出的惊人的协调性，势必促使人们对《周易》进行新的认识。“抽象地说，这不过是科学的辩证思维模式对形而上学机械论的否定，并向朴素的辩证思维模式的复归，似未错，但并未说明任何问题。我想，重要的是对中西、古今的哲学范畴与科学范畴以及思维模式进行深刻的对比分析，揭示其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正如历史上早已有之的‘大同’思想、桃花源式的乌托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理想有其联系和区别一样，朴素形态的辩证法宇宙观和科学形态的唯物辩证法宇

宙观之间也有其联系和区别。为了把握这种联系和区别，就必须逻辑地掌握哲学和科学认识发展的固有的‘圆圈’，还需要对这些圆圈的发展找出前后联系、转化的中介、中间环节。只有经过这样复杂的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才可能说清楚这是怎样‘仿佛的旧事物复归’的。”这里提出了一系列的矛盾，诸如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古代自然科学与现代自然科学，古代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等等，只有透彻地了解了这些矛盾之间的联系及其演进过程，才有可能回答集古代哲学与古代自然科学为一体的《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协调性。这当然不是轻易便能解决的问题。好在探索已经开始，硕果即在前头。

* * *

这一次《周易》学术讨论会，是由武汉大学哲学系、湖北省哲学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发起召开的。原来只打算召开一个五十余人的小型讨论会，但消息一经传开，要求与会的信件便如雪片飞来，结果会议规模膨胀到原来的三倍有余。这也是情势之所使然，说明《周易》研究已经出现了新的高潮，而这次会议将作为这一高潮阶段的象征永久留存在《周易》研究的过程之中。

会议期间，一批知名学者倡议成立《周易》研究会，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会议决定先成立《周易》研究会筹备组，从事研究会的筹建工作，并负责组织下一次《周易》学术讨论会的召开。筹备成立《周易》研究会，是《周易》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需要。可以预料，一旦这个研究会成立，它将会成为团结与组织易学研究者从事学术交流的中心，并给予《周易》研究以极大的推动。

萧汉明

重要更正

本刊今年第5期第51面有如下几处应予更正：

第11行：根抵深厚 应为 根柢深厚

第16行：野孤禅 应为 野狐禅

第17行：正于古诗所云 应为 正如古诗所云

第18行：野孤禅 应为 野狐禅

第25行：带领迫害 应为 带头迫害